

从能力视角初探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

——以Deardorff的金字塔模型和高永晨的“知行合一”模型为基础

周焱

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构建交际主体的知识体系是跨文化教学的关键。知识体系构建有助于高校厘清课程教学内容、培育目标,明晰评判教学成果的标准。本文从“能力”视角出发,评析了国内外多个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并以Deardorff的金字塔模型和高永晨的“知行合一”模型为基础,尝试简化、融合二者并构建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 知识体系; 理论框架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9.455

1、简介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实行,加强培育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已经成为共识。但目前国内外仍缺乏能有效对跨文化教学予以指导和评价的体系^[8]。高校的教学方式具有培育时间有限,培育场景与方式单一等特点;即高校很难通过提供存在高度互动的实践场合综合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个体在认知、思维主导下做出的具体行为^[5];而个人的跨文化知识体系则从属于认知。因此,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是主导行为的重要因素。综上,笔者认为,要在课堂环境下高效、综合地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以首先帮助学生构建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目前,国内外学者此少有探索。本文将以此为目标,尝试从理论层面探讨跨文化知识体系的概念内涵与体系模型。

2、文献综述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在不同研究视阈下不尽相同,学者们提出的相似概念有二十多种,例如跨文化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跨文化有效性等^{[4][6][8]}。其中一些概念强调全球知识,一些强调情感因素,还有一些则侧重技能与行为。这些概念都或多或少有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简单化的倾向,只“着眼于复杂现象的有限方面”^[4]。尽管具体定义尚无定论,Deardorff的阐释却受到了广泛认可,即:“基于个人跨文化知识、技能和态度,使个体在跨文化情景中能够有效并得体沟通的能力”^[3],本文也将采用这一定义。

学者们除了尝试定义概念,还试图探究其内容与组成要素,建立了多个模型,如Bennett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Deardorff的金字塔式跨文化能力模型、Byram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等等。这些模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强调能力发展的过程性,主要描述行为主体在能力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例如Bennett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和潘亚玲的跨文化能力多层次开放式模型。这类模型的缺陷在于忽略了对跨文化能力概念及其组成要素的探讨。另一类则重点探究跨文化交际能力由哪些要素构成,例如Deardorff、Byram、徐佳和高永晨的模

型。由于第二类模型的构建维度(认知、情感、技能等)对构建知识体系具有极强借鉴性,因此,本文主要参考了第二类。

Byram将跨文化交际能力解构为三个部分: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话语能力;及五个要素:态度、知识、解读与联系技巧、探索和交际技巧、批判文化意识/政治教育层面。这一模型的缺陷是在技巧解读上过于细化且无法穷尽^[7]。徐佳的跨文化能力四要素概念模型将跨文化交际能力解构为跨文化理解力、跨文化共情力、跨文化互动力和跨文化反思力。这一模型试图将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切割,但没有挖掘出它作为一种综合性系统的层次性。此外,这一能力模型也没有将四要素内的各个维度具体化,仍然比较宏观,无法在实际教学中运用。综合来看,Deardorff的金字塔模型和高永晨的“知行合一”模型在对跨文化能力的解构上都能保证展现能力系统的层次性,明晰每个层次内的要素内容,保证要素的可穷尽性,因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这两位学者能力模式的进一步评述将在正文部分展开。

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层面,国内外学者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其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1][2]}。有很多学者试图厘清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认知”层。Chen和Starosta指出,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就是交际能力在认知方面的体现,它指的是“对影响我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文化习俗的理解”^[2](Chen, G. M., & Starosta, W. J. W. 1999)。即一种特定的,能让我们辨别、理解、适应自己的和他人的文化,从而以新的方式理解世界万物的“认知方式”或“思考模式”。高永晨(2014)则认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中有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即跨文化交际知识系统。是从行为中产生和发展的,更高悬浮于观念形态的思想知识领域。可以看出,Chen所探讨的“跨文化意识”和高所构建的跨文化交际知识系统的概念有所重叠,又不尽相同。Chen主要强调的是一种“思考模式”,是主体对概念型知识的习得和某种转换认知视角的能力的获取;高则将思辨(critical thinking)能力纳入了知识体系。但这两种说法仍有其局限性,笔者认为“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除了包含以上两位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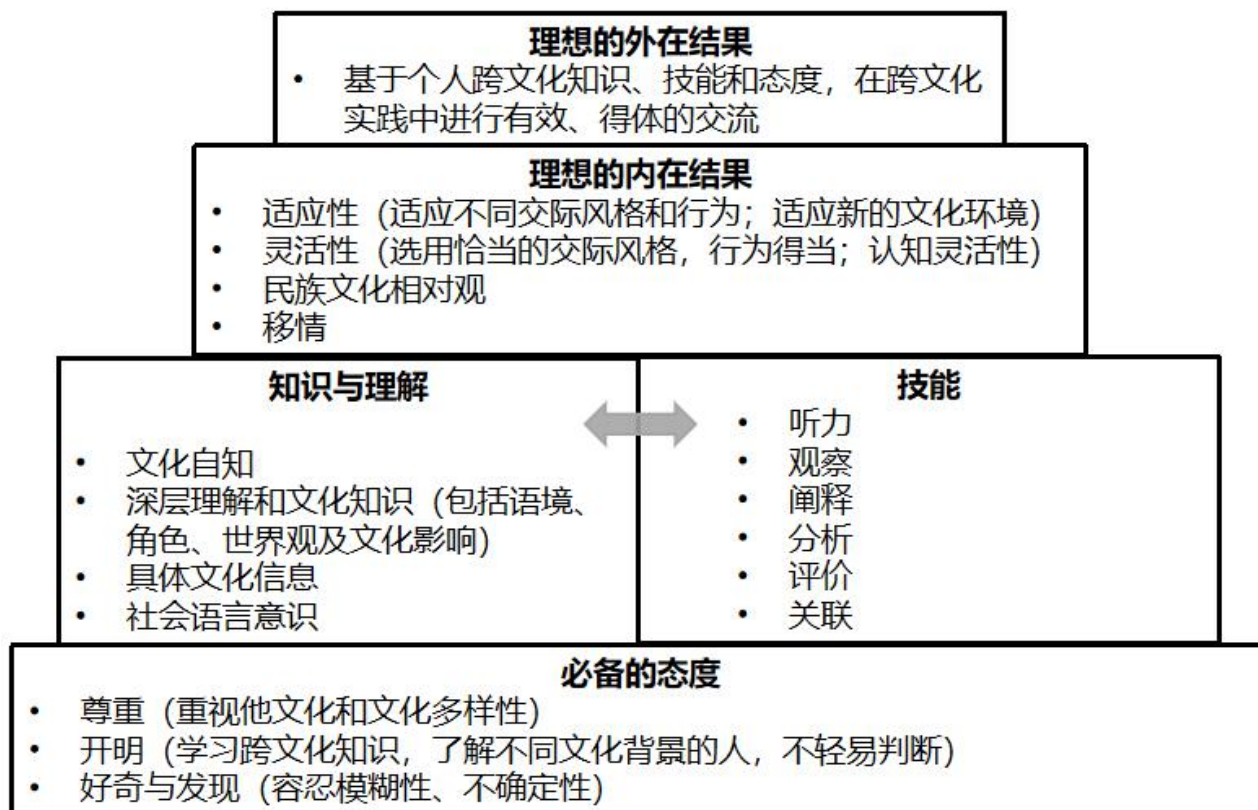


表1 Deardorff的金字塔模型

强调的内容外，还应该包含对某种交际策略、交际技能型知识的理解与习得，某种内在价值观的树立等。

以下，本文将通过评述Deardorff的金字塔模型和高永晨的“知行合一”模型，尝试构建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

3、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构建

3.1 模型评述

3.1.1 Deardorff 的金字塔模型

金字塔模型的第一层是“必备的态度”，是最基础的部分，属于“情感”层面。第二层是两个互相渗透影响的模块，一个是“知识与理解”，另一个是“技能”。其中，Deardorff定义的“技能”是在阐释主体在交际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即主体“运用某种技巧的行为”。笔者认为这里“技能”可能与“理想的外化结果”界定模糊。“技能”这一概念由两部分构成：1，一系列的策略或方法论，它们只存在于交际主体的头脑中，确保主体拥有在交际活动中做出某些反应的潜势；2，当交际主体在具体语境下做出跨文化交际行为时，主体将那些“策略或方法论”放诸实践，此时的“技能”属于“行为”。金字塔模型中的第三层是“理想的内在结果”，包括“适应性、灵活性、民族文化相对观和移情”；第四层是“理想的外在结果”，属于学者们定义的“行为”。

综上，笔者认为，金字塔模型中从属于知识体系的部分为“知识与理解”，“技能”中策略或方法论的部分和“理想的

内在结果”。

3.1.2高永晨的“知行合一”模式

高永晨将跨文化交际能力解构为“知识系统”和“行为系统”两块。前者包含三个子系统：（1）知识；（2）意识；（3）思辨。后者也包含三个子系统：（1）态度；（2）技能；（3）策略。知识系统中的三个部分毫无疑问属于“认知”，但在行为系统中，态度应归属于“情感”层；技能及策略，如4.1.1中分析Deardorff的金字塔模型时所说，应由两部分构成，能否简单归为“行为系统”仍有待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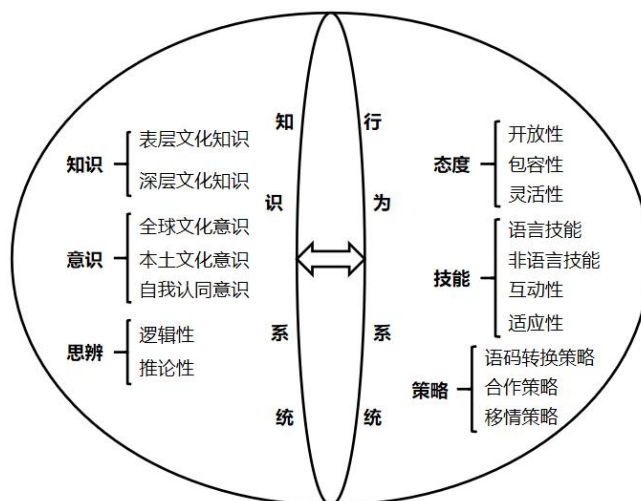


表2 高永晨的“知行合一”模型

笔者认为，该模型中从属于知识体系的部分有：“知识系统”及“技能”、“策略”中属于方法论的部分。

3.2 构建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

3.2.1 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

通过简化与结合以上两个模型，笔者构建了以下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它由概念理解型知识和技能策略型知识组成的“底层知识”和由思辨能力 (critical thinking)，跨文化参照转移框架 (a frame of reference shift) 和意识/价值观组成的“顶层思维”两大部分。前者不断影响后者的建构与发展。后者则在主体学习与掌握底层知识时被不断激活与构建，但一定程度上脱离底层知识存在并不断影响主体学习知识时的选择。这两个系统互相紧密相连、互相渗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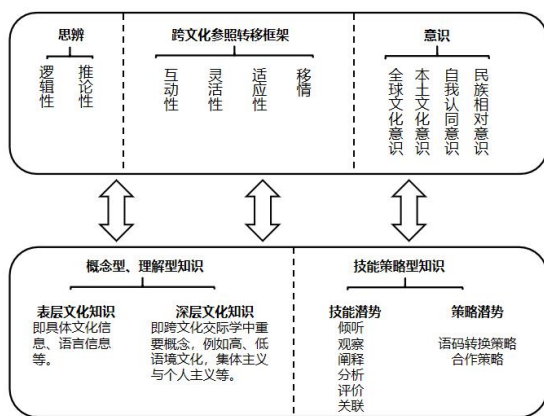


表3 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

3.2.2 底层知识

“底层知识”系统由概念理解型知识和技能策略型知识共同构建。前者包括：(1) 表层文化知识，即具体语言信息，例如对异语言单词的掌握等；与具体文化信息，例如对异文化饮食特征、节日习俗等信息的掌握；(2) 深层文化知识，例如异文化中“内部人”的文化价值观，异文化的具体文化属性，例如高/低语境文化等信息的掌握，这一部分包括对跨文化交际学中重要概念的习得。技能策略型知识包括：(1) 技能潜势，即在具体跨文化交际语境中有效且得体地“倾听、观察、阐释、分析、评价、关联”的潜能；(2) 策略潜势，即在具体跨文化交际语境中有效且得体地运用“语码转换策略”与“合作策略”的潜能。技能策略型知识的掌握可以影响具体技能或策略的实施，是促成得体、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关键。

3.2.3 顶层思维

“顶层思维”系统由思辨、参照转移框架和意识构成。思辨包括：(1) 逻辑性，(2) 推论性，指的是在跨文化交际中运用逻辑推理进行的纯理论、纯概念思考 (高永晨，2014)。参照转移框架包括：(1) 互动性，(2) 灵活性；(3) 适应

性，(4) 移情。在这种框架影响下，交际主体形成的意识/价值观包括：(1) 全球文化意识；(2) 本土文化意识；(3) 自我认同意识；(4) 民族相对意识，表现为某种信念，即对异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异同具有敏感性，以综合、宽容、平等的视角看待异文化与本土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调整自身认知以达到有效沟通的自觉性。

4、总结与展望

从能力视角挖掘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有助于促进跨文化交际教育的发展。本文构建的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以Deardorff的金字塔模型和高永晨的“知行合一”模型为基础，由“顶层思维”和“底层知识”构成，对跨文化知识体系的结构和内容做了初步探究。

本文仍然存在较多问题。第一，本文对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的探究是纯理论的，缺少实证证据支持，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仍有待商榷。第二，该模型只是对知识体系的内涵与组成部分进行了列举与说明，而未探究帮助构建学生跨文化知识体系的课程中需要的课堂活动。因此，这一理论模型还没有触及到现实问题的核心，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 Bennett, M. J.. (1986).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training for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0 (2), 179-196.

[2] Chen, G. M., & Starosta, W. J. W. (1999).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of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Human Communication*, 2, 27-54.

[3] Deardorff, & D., K.. (2006).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 a student outcom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0 (3), 241-266.

[4] Fantini, A., & Tirmizi, A.. (2006). Explor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federation of the experiment in international living*.

[5] 高永晨.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体系的理论框架构建[J]. *外语界*, 2014 (04): 80-88.

[6] 焦晶. 国外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50年[J]. *晋阳学刊*, 2017 (05): 117-125.

[7] 徐佳. 跨文化能力概念模型内涵的扩展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18 (01): 181-186.

[8] 袁靖. 构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量表的理论模型——基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J]. *外语学刊*, 2021 (01): 74-78.